

1906

和平文史



88

第四辑

政协和平县委员会文史组编印
一九八八年四月

广东

517200

总第4辑

447-1-5

和 平 文 史

第四辑

政协和平县委员会

文史组编印

一九八八年四月

目 录

龙川和平两县建党记·····	麦 任(1)
革命母亲梁水娣·····	唐 瑜(11)
和平县文物简介(三)·····	杨廷强(16)
大坝中心小学史略·····	袁昌盛 陈赞廷(28)
和平县医卫事业史话·····	罗介民(36)
广东和平制药厂史略·····	黄保江(43)
中医师徐家鼎·····	徐天福(53)
我的父亲袁云蔚·····	袁海钦(56)
赖政均先生行历·····	赖良材 刘梓星(63)
周刚如先生事略·····	何松杏整理(68)
龙子山古墓·····	杨廷强(73)
和平山城春秋·····	何松杏搜集(77)

附录：黄桂荣考取拔贡的两篇文章

龙川、和平两县建党记

麦 任

一九三八年三月，省委分配我去龙川县建党。省委一个姓马的同志找我谈话说：“龙川县还没有党的组织，连一个党员也没有，你的任务是到老隆去找一个党的同情者，在那儿立足，开展工作，逐步把党建立起来”。我想，我刚从延安中央党校结业分配回广东工作，这是党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，不管有多大的困难，也得承担，便毅然接受了。过了几天，姓马的同志交给我一封信，说信是一个同志写的，介绍我到老隆去找黄用舒，说黄是党的同情者，在老隆是个大乡绅，系国民党大官员黄强的兄弟，现在老隆师范任教，并是一个百货店的股东，要我通过黄用舒在老隆找好立足点后即写信告诉省委，以便于联系，给我定好联络暗号和地址，给了路费，我便单身出发

了。

去老隆是从广州乘长途汽车去的，当时的公路破破烂烂，汽车也是破破烂烂，到老隆仅二百多公里要分二天走，头一天到河源县城，翌晨从河源过江，再乘到老隆的车，记得第一天的破车在路上跌跌撞撞，到博罗县桂山脚下时，竟同迎面而来的一辆货车相撞，车上一个乘客撞断了一双手臂，我捏了一把汗，因为断臂乘客的坐位，一直是我坐着的，后来半途有人下车，我才挪到别的较舒适的座位上去，幸免于难，我暗叫马列在天有灵，不致出师未遂身先残。那个出事的司机畏罪乘乱逃跑了，把一车乘客抛在荒僻的桂山脚下，时是下午四时左右，乘客叫苦连天，后来得另一客车，告诉河源汽车站，才派车来，到河源时已是掌灯时刻了。第二天中午抵老隆，按地址在横街一间百货店里找到了党的同情者黄用舒，他看了介绍信后待我还算热情，把我安顿在百货店暂住。从此，我盘算着在完全陌生的小镇上工作应如何开展？黄用舒是怎样的人？几天后，我了解到老隆是龙川县的一个镇，距龙川县城（陀

城)二十里，沿东江而上是和平，下游是河源、惠阳，故是东江上下游物资的集散地。镇上约二百家商店，看不见工业和手工业，虽然时有警报，但日本飞机还没丢过炸弹。镇上有个抗敌后援会，是国民党官办机关，仅是挂招牌向商店收钱的机构。镇上没有抗战气氛，连抗战的标语也少见。至于黄用舒，接触了几天，觉得他仅仅是个同情者，对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、作用，他还带有等着瞧的态度。看来此人不是首先发展的对象，知识分子是开展工作的桥梁，作为桥梁却很合适。我迫切要求找职业，以解决生活和掩护问题，黄乐于帮忙。初时想去老隆师范当个职员之类，但因故未遂。而现在的百货店的伙计们都是股东们的亲戚，除了吃店的，一个月每人赚十元八元回去养家，他们忠心耿耿为老板服务，阶级觉悟、民族觉悟，还是很低的，在这里没有发展前途。而且光凭黄的关系在该店吃饭，会引起另一些股东的不满，所以处境困难。连连碰壁，连吃饭也成问题了。在无人可以商量的情况下，我想自己是

个共产党员，在延安受了党中央、毛主席那么多的教导，想到抗战以来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，广大革命群众心向延安、心向党，老隆这个地方岂能例外？孔夫子说过：

“十室之邑必有忠信”。老隆自必有革命之士，问题在于时间短，还没有机会发现。我暗下了决心克服困难、去争取胜利。于是写信给省委报告情况，并表示决心，还要求寄点钱来维持生活。省委回信鼓励我坚持下去，并寄来六元钱。我凭这点生活费向黄表示不想再在百货店吃饭了，免他为难。不久黄介绍我到镇上抗敌后援会当文书，但声明是义务职，我想有个职业作掩护总比没有好，权宜之计，就去当文书了。

抗敌后援会设在镇小学的一个小房间里，委员是区长、镇长、驻军的头头、大商人、大士绅和校长之类，借这个招牌向商店收钱，平时很少开会，开起会来，委员们个个官腔十足，散会后空无一人。我作为唯一的一个办事员，根本没有什么好办。但却有机会结识学校的老师们，了解到这批老师都是地主或士绅们

的子弟，当中有些竟是嫖妓的行家。有个老师叫骆冠群，虽是个大地主的儿子，为人倒有点正义感，对抗战有点兴趣，他见我对抗战形势有见解，谈吐不俗，可怜我是个“落难书生”，愿在经济上支持我，我婉却了。然而时间久了，又觉得他士绅味很浓，难作建党对象，在镇小学找建党对象的打算又落空了。后来后援会每月给我六元，算是解决吃饭问题，但工作仍无进展。

一天，黄用舒引我过河去莲塘乡会见他的大地主父亲和家人，并到莲塘乡小学去走走，莲小是乡办小学，黄用舒兼校长，只有学生百余人，高年级学生更少。校中连同兼总务的黄用舒的干儿子共有老师四人，一个是逊清秀才，一个是落第书生，都六十多岁了。一个年青人名叫黄慈宽，交谈之下，觉得黄慈宽对抗战很关心，对党有一些认识，对革命也有热情。后来黄用舒向我介绍说，慈宽年幼丧父，无以为生，母亲把他送给人家当干儿子，不幸义父又死了，家道贫穷，靠祖父拉扯熬大，勉强在陀城中学念完初中，就在莲塘小学教书，是个有

志气的青年，人品好。我想，在建党对象问题上可能是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了，为了进一步了解接触此人，我向黄用舒提出，工作之余我愿意义务在莲塘小学担点课，黄答应了。

在莲小担课的日子里，我和黄慈宽同食、同住、同床睡，我谈了当前的抗日形势，谈起了八路军、新四军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后来还谈到了延安和毛主席，这一切黄慈宽是多么渴望得到的知识啊！他抱着无限的激情领会我讲的每一句话，后来他干脆问我是不是共产党，我觉得他出身成份都好，有民族觉悟、阶级觉悟，可以培养，于是我摊了底，表明身份，黄慈宽欢喜若狂，向我提出要求入党。不久我当了入党介绍人，给黄慈宽举行了入党仪式，由我写了入党的誓词，黄慈宽庄严地宣誓入党。

有了这颗红色的种子，局面容易打开了，我热情地把延安所学有计划地传授给黄慈宽。他如饥似渴地学，随后，与之研究发展党的问题，他介绍了三个知心朋友，一个叫余丁运，

一个叫大刘（名字我记不起了），一个叫魏南全，都是他在陀城中学念书时的同学。余丁运家庭属小康，是莲塘乡的抗日自卫团的大队长，大刘在莲塘乡一所私塾教书，收入极微，家中也是赤贫的。魏南全陀中初中毕业后到广州念高中，当时回陀中寄读。于是由黄带我去逐个会见他们，找魏南全时，他已放暑假回到老远的家乡，暂时无法见到。余丁运和大刘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培养，他俩都具备了入党的条件，于是发展了他俩入党，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，我认为不必实行单线领导，于是在老隆建立起龙川县的第一个党支部。那是一九三八年六月，我当支部书记，还举办了短期学习班，我将在延安所学的一些关于党的知识，向大家讲了，要求大家密切联系群众，物色对象，继续发展组织。

建立起第一个党支部之后，黄用舒介绍我认识了和平县来的罗响，据说，罗是他的朋友中比较有抱负的青年，贫苦的知识分子，在龙川县城“和平县杉业公会”当理事，管理从和平县运来的杉排在龙川出售事宜。此后在接触

中，我觉得罗响对抗战对党都有一定的认识，他对我也是相见恨晚，我们谈得很投机。后来罗响向我谈起他曾和两个知心朋友为了找党，曾几次到赣南吉安附近的老苏区去，但都没有找着，欲进无门，我暗示愿意和他们一齐去找。乘机要求他带我到和平去会一会他的知心朋友，作进一步的了解。

农历六月，骄阳似火，我和罗响从老隆出发步行一百五十华里去和平热水乡。第一天我们从下午开始在烈日下走了五十华里，到东水墟已日落时分，一路上给烈日晒得皮肤发烫，汗流浹背，夜宿东水墟小旅店，店楼上房子很矮，伸手可及，热得象在蒸笼里，一夜无法入睡，翌晨天未亮即起来赶路，中午到达彭寨墟吃过简单的午饭又起行，顶着烈日行到和平城已是下午三时，我欲见罗响的知心朋友心切，请他马上请来。不巧，知心朋友黄惊白到外地去了，无缘会面，待在和平城无事，我主张罗响继续前进，赶回他家乡热水。从和平城到热水乡要翻过一座大山，上下都十五华里，一路上峰峦连迭，树木葱笼，真是个好地

方，抵达热水乡已时黄昏，我住在热水乡小学。学校刚好放暑假，学生和老师们都回家去了。罗响的知心朋友之一张觉青，是学校的老师，还留在学校里，我们一见如故，痛痛快快谈了一晚上的话。

热水乡群山环绕，处处是密林，一条不通舟楫的小河绕村而过，河中有好几处有温泉冒出，所以叫热水河。为了了解罗响的家庭情况，第二天中午到他家里吃午饭，罗响家的陈设古老陈旧，是普通的农民家庭，父母都不在了，家中只有个祖母，午饭有几片猪肉，就算请客了。这光景在我看来更增加了发展罗响入党的条件，这一天晚上，罗响、张觉青和我一起在小学吃饭，饭后一起到热水河去游泳，尝尝温泉的风味。

经过在热水乡两天时间的交谈了解，觉得罗、张两人都具备了入党条件。他们三人多次去赣南老区找我们党是真的，他们要求是很迫切的，于是在我离开热水乡之前就吸收了罗响和张觉青入党，他们俩就成了和平县的第一批党员。

在龙川、和平初步把党建立起来以后，我回到广州向省委汇报。省委书记大张同志（后来知道叫张文彬）完全批准了我发展的新党员，对我这一段的建党工作加以肯定，特别对热水乡的党抱着很大希望，说那儿是粤赣边区，受过老苏区的影响，是将来搞武装的好地方，新入党的罗响同志当时是任乡抗日自卫团的大队长，手上有武装，在群众中又有一定威望，这对党将来在那里搞武装是非常有利的。大张同志给我总结了我这一段工作之后告诉我，党给你的任务算是完成了，要我再回老隆一趟，把黄慈宽和罗响同志带到广州来参加省委办的训练班，还要我回老隆后代表省委到五华去一趟，了解那边党的工作情况，把钟清寰同志也带到省委来学习。这个任务完成以后，大张为了表示对我的鼓励，还特意同我上饭店吃了一顿饭。省委大张同志的指示，我都照办了，那是一九三八年八月。后来，省委另行分配我的工作。

——（转载《广州文史资料》选辑第二十四期）

她永远是革命的母亲

——悼烈属萧母梁水娣

唐 瑜

梁水娣病逝的电报，使我黯然半天，望着窗外辽阔的苍天出神，一幕幕褪了颜色的往事从记忆中泛起，仿佛是昨天刚发生的那样清晰。

我初识梁水娣是在反“扫荡”的一个深夜，游击队处在艰难的时刻。我们那个中队黑夜里转移到古寨乡蒲畲村。春寒未尽，风雨交加，浑身上下又湿又冷，连裹在包袱里仅有的替换衣服也湿了，简直令人无法可想。我一进入村舍，就被厨房里映出的火光吸引进去了。一个正在烧火的中年农妇热情地招呼我这个陌生人，“哎呀，淋得这么湿，是雨伞不管用吧？快暖暖身子。”我一打量，几位战士已在她弄的火笼旁烘开衣服了；她边说还边给我们倒热

水洗澡，一点也不介意这几个同志“未遵守群众纪律”（按规定我们必须自己找柴、挑水）。她的亲热给我带来的温暖，一下子驱去了周身的寒意。要知道，在那个严酷的反“扫荡”的情况下，游击队活动的范围已越来越小，许多群众因害怕株连不敢接待我们了。从旁边战士与她的无拘束的谈话中，我才知道她就是我们的中队长萧琴书的母亲梁水娣，算是回到老家了。

也是在那个时刻，我奉命陪一位病号在赤刘坑隐蔽，部队则执行任务去了，说定三、五天后会到村里来。我们两个都不是九连山区人，人生地疏，全靠赤刘村的一个堡垒户照应。不料约定的期限已过，部队杳无消息，而敌人搜山的传说却接踵而来。堡垒户心慌，没人商量，跑去找梁水娣。她来了，给我们引路转移到纸背坑，之后，我们又转移了一次，部队才回来。

在那个黑暗的日子里，梁水娣全家出生入死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不停息地战斗。除了大儿子萧琴书外，她的三儿子萧波中是独立武工

队长，她和二儿子萧炳章自然地成了部队最可靠的堡垒户。她以一个农妇的身份，为游击队传递消息，送信送粮送款，起着一个正式战士所起不了的作用。她替游击队隐藏所征取到的稻谷，黑夜里磨成大米，挑送到山窝；为伤员安置掩蔽的山寮，给他们送药；为战斗中失散的战士指路，让他们迅速归队。游击队在强敌的冲击下常有人失散，但多数同志都是当地人，一旦失去联络就偷偷跑到她家去打听，而她也总是能在附近找到他们，告诉他们归队的地点。担当中队长和武工队长的儿子信赖自己的母亲，梁水娣准知道部队的行踪。

她曾不止一次地面临死亡的威胁，她的家就曾被敌人两次烧毁，而她都是在敌人进村时逃脱的。一次，敌人在拂晓前来包围蒲畲村，她恰因那夜转移寄宿于叔娘家，天未亮出门来，在路口碰个正着，靠着浓雾的蒙蔽，在千钧一发之际躲进溪水中避过去了，死神没有把她吓倒、挫伤她的斗志，直到形势迫使她不能坚持在村里，只好随队行动的时节，她就给同志们缝补衣服，照顾伤病号，找寻草药，在弹

雨纷飞的战斗转移途中，她还抢着为身体瘦弱的战士分背包袱，帮助他们轻装行进。

1948年8月，梁水娣随和东游击区的主力转移到河西（属河源县）。她的小儿子萧波中因病留和东掩蔽，与二哥炳章在同一天被敌人搜捕，壮烈牺牲。当中队长的大儿子萧琴书不想瞒住母亲，把消息告诉她，说：“你宽心，我活着呢！我就打回和平去，你留在这里吧！”没想到就在部队向和平回头时，萧琴书也牺牲了。同志们担心她挺不住，就相约瞒着，找词应付，说是队长“失了联络”、“负了点伤”，甚至冒儿子的名义给她写信。但是，梁水娣很快就觉察出来了。做儿子的会失联络？这种事连她也没有过；儿子从来习惯叫“娘”，那里写信会改称“妈妈”？她哭了一场，主动把话挑明了。

她以无比的毅力承受着这一打击，在河西区坚持下来，继续尽自己的力量支持游击队，直到解放后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，参加清匪反霸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。她从受儿子的影响，跟着儿子活动开始，以自己的不屈不挠斗争成